



30



YUNNAN
CAIZHENG
ANSHINIAN

774

任希文

责任编辑:金 季

封面设计:熊惠明

云南财政三十年

任希文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85,000

1990年 月第1版 1990年 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22-00339-0/F·55 定价: 3.55 元

序 言

任希文同志 1938 年参加革命后，在老解放区从事财政工作。1950 年初奉调云南，在财政厅工作期间先后协助吴作民、崔昌宗、陈文祺几任厅长工作；1973 年后他全面主持云南财政工作，直至 1980 年调云南财贸学院负责教育工作。

这本回忆录是他在离休后历时数年写成的，多数篇章是他在病中撰写的。这种刻苦顽强，孜孜不倦的精神，热爱毕生从事奋斗的财政工作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应当学习希文同志对党，对人民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从希文同志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学到老一辈领导同志的理财思想和领导方法。他们在决定重大政策问题时，总是亲自深入基层，多方调查研究，集体反复讨论。这对于我们各级财政部门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启迪，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教验，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特别是对作民、昌宗、文祺等老领导的深情回忆，将推动我们财政部门的廉政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

希文同志参与了筹组新中国成立后的云南财政厅工作，加之他勤动手，善记录，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财政历史资料，并撰写成这本回忆录。这些历史资料，对于我们从事财

政实际工作、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我们应当认真阅读，从中吸取教益。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点。

最后，我希望我们从事财政工作的老同志，学习希文同志拿起笔来，创作更多更好的回忆文章，以推动云南财政工作的发展，促进云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陈懋军

1989年9月1日

目 录

听从祖国召唤 奔赴边疆云南	
——西南服务团财税队组建、行军与到 云南的情况·····	(1)
顺利进行接管 创造良好开端	
——接管云南财政工作的回顾·····	(9)
难忘的战斗	
——征收 1949 年公粮的回忆 ·····	(17)
统一集中才能克服财政困难	
——解放初期云南执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决定的情况 ·····	(29)
人民税收的建立	
——云南解放后工商税收工作的情况回顾 ·····	(37)
建设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	
——云南解放后财务会计制度建设的回顾 ·····	(45)
五十年代初期的乡财政 ·····	(52)
五十年代初期的专卖制度 ·····	(56)
五十年代初期的“机关生产” ·····	(60)
要十分重视机关的建设	
——云南解放初期财政厅机关建设的回顾 ·····	(65)
财政工作的历史性转变	
——回忆由供给财政向建设财政的转变 ·····	(73)

保证建设 摸索前进	
——“一五”期间财政计划执行情况	(81)
云南“大跃进”期间财政工作的回忆与思考	(90)
三年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云南财政工作	(105)
对 1963 年云南纠正财政收入偏高“错误”	
的再认识	(119)
关于云南民族地区农业税负担的回顾	(136)
关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工商税收负担的回顾	(149)
人才需要教育	
——云南财政干部教育发展回顾	(156)
也谈教育经费	
——回忆阎红彦同志为增加云南教育经费	
所作的努力	(170)
“十年动乱”中云南财政工作的片断回顾	(178)
风范长存	
——怀念吴作民同志	(187)
深切的怀念	
——写在陈文祺同志逝世两周年	(194)
云南财政三十年	(199)
后 记	(248)

听从祖国召唤 奔赴边疆云南

——西南服务团财税队组建、行军 与到云南的情况

三十七年过去了，三十七年前我们这些人，从不同地区不同岗位奉调来云南。岁月的流逝，如今青年变成老年，壮年已近古稀，有的同志因积劳成疾已与世长辞。三十七年中走过的道路是坎坷而崎岖的，在此期间，虽然，有的同志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不公正对待的同志多数得到改正，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们财税队的同志们在云南财政税务战线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回忆我们财税队的组建、行军与来到云南的这段往事，对我们财税队的每个同志来说，都还是值得追忆的。对过去的回忆，将激励我们继续前进。

（一）财税队的组建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抢渡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为了解放大西南，7月间在南京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鉴于当时解放大中城市后财经干部缺乏，二野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为云南支队抽调一批财经干部，到云南工作。1949年9月初中共河北省委及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决定，由河北省所属部分专区抽调一批财税干部赴云南省工作，到9月底基本抽调完毕。当时从河北省所属通县、唐山、石家庄、邢台、衡

水等专区及邯郸市，省财政厅共抽调税务干部 100 余人，财政干部 30 余人，集中到河北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保定市，待命出发。在保定期间，河北省财政厅组织我们进行了一些学习，主要内容是形势教育与认识支援新解放区的必要性。由于各地在抽调干部时，思想工作做得不细，有的地方说是到保定学习，有的地方又只说南下，并未说到什么地方，因此当我们这批人得知是到云南后，一方面由于河北省到云南省确实路途遥远，另方面也受旧社会对云南传说的影响，什么“云南是烟瘴地区”，瘴气如何可怕，“云南是发配充军的地方”，山高路远，语言不通，因此引起部分同志对云南的畏惧，思想产生波动，不愿到云南工作，后经反复做思想工作，介绍云南的真实情况，激发每一个同志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自觉性。当时抽调的大部分同志都是青年干部，都有一颗为祖国献身的火热心，经过说服动员后，都愉快地接受了南征的任务。一致表示愿把青春献给解放大西南的伟大事业。临走前河北省人民政府向每人赠送一本笔记本，笔记本的首页印有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亲笔题词：“敬祝南征胜利，身体健康”，以资纪念。于 11 月中旬由当时河北省税务局长翟昌宗同志带领，离开保定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与已集中待命出发的从北京市税务局抽调的税务干部 19 人汇合，这样财税队共有 154 人，这批同志的政治素质及业务水平都是好的，其中党员 83 人、团员 9 人，党团员占总人数的 60%，抗日时期参加工作的 66 人，占总人数的 43%。从业务上说都是基层搞财税工作多年的同志，以后并把这 154 人编为三个中队：

一中队是以唐山地区税务干部为主组成，共 43 人。

队长张云祥 副队长韩绍增。

二中队是以通县、石家庄地区税务干部为主组成，共 52 人。

队长韩子洲 副队长贾波 指导员赫文祥。

三中队是以唐山、通县、石家庄、邢台、衡水等地区及省财政厅、邯郸市抽调的财政干部及北京市抽调的税务干部组成，共 59 人。

队长任希文 副队长张铁良、潘振忠

中队下设班，行军与学习多数以班为单位活动，在北京期间财税队三个中队与贸易队共同组成财经大队，由吴作民、翟昌宗二同志领导。

（二）三个月的行军生活

1949 年 12 月 9 日我们离开北京向云南进发，由于平汉路当时石家庄至郑州段未恢复通车，在 12 月 9 日下午由北京乘火车经天津沿津浦路到徐州，转陇海路到郑州，再沿平汉路于 12 月 12 日到达武汉。我们这部分同志都是长期在农村工作，没有离开过家乡，这样的长途行军，对每个同志也是一个考验。车过天津后，除个别人意志薄弱，中途离队外，多数同志情绪饱满，士气高涨，都盼望能早到云南迎接新的任务。

在武汉停留了半个多月，一方面休整，一方面进行轻装，准备从武汉经长沙，然后步行进入贵州，再到云南，虽然步行会有很多困难，但大家还是坚决执行大队部的决定，积极进行轻装及其他步行的准备工作。以后由于在武汉获悉云南已和平解放，应争取早到云南，同时湘西土匪暴乱比较严重，步行不能保证安全，后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后勤副司令员刘岱峰同志指示，由武汉改乘长江航轮前往重庆接受任务，再转赴云南，遂于12月27日离开武汉乘江轮溯江而上，由于舱位少，除少数领导同志外，大部分同志住在货舱，人多面积少，十分拥挤，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过夜，有时连腿也伸不开，更不用说睡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咬紧牙关，克服困难，于1950年1月2日到达重庆。船过三峡，两岸风景如画，壮丽的山河，勤劳的人民，碧绿的禾苗，深黄色的柑桔，呈现出“天府之国”的美貌，激励着每个同志热爱大西南的豪情。在重庆休整了十多天，于1950年1月中旬由重庆改乘汽车经贵阳到达贵州省的盘县，沿途山峦叠嶂，峰回路转，盘山公路蜿蜒于群山之中，车队迤逦而行，路窄弯多，七十二拐尤为奇险，我们这些来自华北大平原的人，虽然过去也听说贵州是“地无三里平”，身临其境才有所体会。由于四川、贵州都是解放不久，境内山区仍有小股土匪出没，在重庆给我们发了部分枪支弹药，每个队都组建了一个武装班，这段行军大家警惕性很高，都能遵守纪律，并随时准备打击劫路的土匪，每日车行百多公里，沿途不时有土匪劫路的警报，各队都严阵以待，闯过险境，每到宿营地大家都能听从队部安排，秩序井然，最辛苦的是管理生活的同志，到宿营地后，他们首先是忙着安排大家住宿与吃饭，其他同志都休息了，他们还在准备第二天的行军事情，车队出发了他们还要检查宿营地有无善后事宜要处理，所以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不应该忘记的。

到达盘县后与云南支队其他几个大队会师，并听取了支队部对云南情况的介绍，学习了宋任穷政委对进入云南后“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报告。通过学习认识到与云南本地

干部团结好的重要性。在盘县休整学习一段时间后，于2月9日由盘县进入云南沾益，到达沾益县后，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及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随即与六支队、四野部队举行了联欢会师大会，会上云南地下党及边纵的领导同志郑伯克、朱家璧向大家作了报告，介绍了云南情况及卢汉将军起义后的形势。在沾益待命期间并抽人参与了盐务队的组建，军管会成立后，财税队由沾益移住小石坝，在小石坝期间调整了组织，把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一部分同学划归财税队，等待接受新的任务。

（三）学习党对新解放区的征粮收税政策，为接受新任务打好基础

1949年11月中旬到达北京后，听取了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鏊的南下动员报告，随后部分同志又听了11月24日召开的首届全国税务会议总结，对统一全国税收，建设新税制和加强税务工作的要求，有所了解。

到达重庆后，先后由西南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岱峰及西南财政部副部长贝仲选二位领导向我们讲了新解放区财政税收政策。刘岱峰副主任，贝仲选副部长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大军进入西南，又接收了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解决吃饭穿衣就是首要问题，我们缴获敌人物资很少，因此首先须抓财政供应问题，财政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做好征粮收税、统一货币、建立人民币市场。征粮征税，要抓紧时间，争取先机，时间拖长，对我们不利。目前西南财政困难较大，要靠中央补助，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与超额完成财政任务，争取做到中央少补助。同志们到云南后，任务很重，一到云南即会投入新的战斗。过去在云南国民党政府的征粮

办法是零征碎敛，我们的办法是一次征收，群众对我们的办法会不习惯，要注意多做说服教育工作。要利用国民党政府过去的征粮收税机构，一面征收一面整顿，要加强政策宣传，注意发动群众，对原有税务人员在接管后，要加强监督检查，防止其贪污受贿，我们到云南后都是财税战线上的骨干力量，要与当地干部团结好，要善于与他人合作共事，共同为解放云南，为完成云南财政任务而努力工作。此外西南区领导同志还讲了新解放区征粮收税的一些具体政策要求。这些讲话对当时财税队的同志们来说，是用政策武装了大家的头脑，对大家鼓舞很大，初步懂得了到新区后，工作如何开步走，我们组织了大家对几位领导同志讲话的学习讨论。以后并按照这些指示精神拟定了接管后的云南征粮收税办法，到盘县后，又学习了宋任穷政委对进入云南后有关政策的报告，这些讲话，对我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做好云南的征粮收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接管工作开始，立即投入征粮收税

1950年1月下旬在贵州盘县与云南支队其他大队会师后，一方面学习宋任穷政委1月27日对进入云南后关于与地下党会师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主要是如何对待起义人员等问题），如何做好财经工作问题，以及接管工作要求等报告精神，另方面抽调少数同志做接管工作的准备，如了解国民党时代的田赋征收办法，工商税收办法，市场情况，并草拟征粮收税办法等。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陈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的率领下进入昆明，卢汉将军主持了入城欢迎仪式，昆明人民群情激动，沿街夹道欢迎，盛

况空前，到昆明后，经过积极准备于1950年3月4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全省各地也先后展开接管工作，与此同时，1949年公粮征收与1950年工商税的征收工作相继展开，我们财税队的同志们根据工作需要都分赴各自新的工作岗位，大家满怀革命激情，接受新的任务，一旦宣布分配工作后，背起行李，立即行动，很少提出什么困难，都能服从组织分配，有些同志分到一些专区任财政科长、税务局长，有的同志虽已年过半百，也毫不犹豫地到较困难的地方工作。当时边疆许多县从公路边到达这些县，要步行四、五日或十多日，越过未开垦的瘴疠地区，随时会受到疟蚊的侵袭，患恶性疟疾，但分到这些地区的同志不顾这些困难，坚持到达目的地，所有同志一旦到达新的工作岗位，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建立新机构，积极开展工作。

昆明地区接管工作，于3月底基本告一段落，解放前的云南财政，收入很少，支出靠发行纸币及低成色的半开银元维持，所以财政上除接收大米120万斤外，就是接管了一笔债务——财政透支银行银元（大头）133.3万余元。因此摆在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建立财税机构，立即进行征粮收税，以保证军队与党政人员的供应。1950年3月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财税机构也随着而建立。并进入了紧张而艰巨的征粮收税工作，随着工作的开展到1950年底全省13个专州市131个县（市）建立了财政机构，13个专州市101个县成立了税务机构，全省共有财税干部5230余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与云南全体干部团结努力共同完成1949年公粮大米3.9亿斤，1950年工商税收5468万元，取得了显著成绩，除保证党政军的供应外，还价拨给贸易总公司大

米 6400 万斤，供应市场，以稳定物价。

三十七年来，云南财税队伍已发展到 21000 余人，而三十七年前准备解放云南时，组建财税队伍即是从这 150 余人开始的。在这三十七年的岁月里，我们财税队的同志们，在不同岗位上与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经受了各种考验，从解放初建立财税机构，开展征粮收税工作到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作了大量工作，对克服当时财政困难，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云南财税工作的开创是起到了骨干的作用。目前少部分同志仍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大部分同志已年过花甲离职休养。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边疆——云南的解放事业与建设事业。今后在有生之年，将继续为开发云南，为云南的经济腾飞贡献自己的最后力量。

顺利进行接管 创造良好开端

——接管云南财政工作的回顾

云南是和平起义接管的省份。云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的工作，是在 1950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由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代表，正式接管原国民党云南省财政厅、会计处、审计部驻云南审计处三个单位的基础上开始的。由于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云南工作应坚持“团结第一”的方针，依靠云南地下党的积极配合，并在接管之前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整个接管工作，是顺利的和成功的，为云南的社会主义财政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一）接管云南财政税收的准备工作，早在老区就已着手进行

1949 年 9 月，河北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指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抽调了一批财税干部，准备南下到云南做财税工作。任希文等被抽调的干部在河北保定集中期间，就着重了解了河北省财政厅的组织分工，以及主要制度的建立情况，以便为接管云南财税部门后开展工作作必要准备。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财经大队于 1950 年 1 月到达重庆。根据西南区财委关于“接管工作开始后，要一面接管，

一面开展工作，把主要力量放到征粮收税工作上”的指示精神，大队由重庆到达贵州后，就把主要力量放在准备接管云南工作及拟定征粮、收税的政策准备工作上。拟定政策，首先要了解情况。为此，云南支队党委在贵州盘县派出了农村、城市两个调查组，在云南地下党的协助下，农村调查组到宣威、沾益两县，对农村经济、阶级关系状况及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民负担状况进行典型调查；城市调查组到昆明市了解工商业及其他经济、财政税收等情况，为接管后恢复生产、征收工商业税、发行人民币等工作作准备。

与此同时，吴作民同志带领任希文等同志，随宋任穷同志到贵州安龙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部会合，草拟进入云南后征收 1949 年公粮及工商业税的方案。征粮收税政策，主要根据中央、西南区财委指示精神，以及当时掌握的一些书本资料（如解放前张肖梅所著《云南经济》，1941 年国民党云南省财政厅编印的《云南清丈（土地）概况》，西南服务团编印的《云南财政概况》等）草拟。初步草拟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并与农村、城市的经济调查材料印证后，大家认为基本可行。遂确定 1949 年的公粮征收，采取以田赋银额计算，有免征点，分十六级累进征收的办法。工商税收方面，1950 年 1 月政务院已正式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央与西南区财委指示，新解放地区可以暂时沿用国民党时代的工商税征收办法。根据云南情况，经研究确定：

1. 已为我滇桂黔边区纵队解放的地区，因已执行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仍然执行全国统一规定。

2. 新接管地区，接管国民党税务机构后，暂时沿用国民

党时代的工商税征收办法。对旧税务人员，则规定守则让其遵守，并派军代表监督执行。

3.财务会计制度，待接管后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拟定。

(二) 云南地下党也在敌占区积极进行协助接管的准备工作

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及其下属的财政厅解放前早就有共产党员积极进行活动。到 1950 年 3 月正式接管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直属的四厅（民政、财政、建设、教育）、三处（秘书、总务、会计）员工中，计有共产党员 14 人，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成员 101 人（审计处党员 1 人，新联成员 10 人未包括在内）。其中，财政厅有共产党员 6 人（其中李剑秋、张亚民、高天鹏三人于 1949 年“九·九整肃”后去游击区），新联成员 15 人；会计处有党员 2 人，新联成员 12 人。

1949 年冬，我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挥师向大西南进军。云南是和平起义还是武力解放？当时局势不明。为了防止机关文书档案、资料毁于战火或被转移（当时传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准备西迁保山作垂死挣扎），不利于人民政权建立后开展工作，根据地下党昆明市委指示，省政府各厅处地下党的同志，利用工作条件或所影响的进步职工，曾经秘密收集抄录了一部分重要档案资料，财政厅抄录的资料包括税收、田赋收入、岁出、云南省银行存款等。

1949 年 11 月间，川黔两省先后解放，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危在旦夕，地下党昆明市委及时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